

# 中村敬字的儒學觀、宗教觀及其西洋學問探索

徐 興 慶

## 中村敬字の儒教觀、宗教觀及びその西洋學問の探索

### 要旨

本稿は中村敬字（正直、1832-1891）が昌平坂學問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及びヨーロッパ留學によって、育んだ文明論、進化史觀、自由論、政體論などの啟蒙思想の特徴を考察する。また、彼の洋書和訳の役割及び東西文化の融合の理念を實踐していくプロセスの中、漢學の學問と西洋科學の応用性を、如何に兩立すべきかという方法論を考察し、彼が唱えた儒教の學問とキリスト教義の論點を通じて、その「自他認識」の轉換と「人民に活用させる」新しい學問の形成を検討す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

## 前言

日本幕末維新期新學問形成過程中，中村敬字（正直，1832-1891）主張「以事為主」的日本漢學應輔以「以理為主」的宋學，倡導「以經為翼」（〈論經學〉，《敬字文集》二）。他肯定提倡經世思想的荻生徂徠（1666-1728）對日本學術發展的貢獻，並且強調日本追求「富國強兵」必須先對韓非子的學說重新評價（〈韓非論〉，《敬字文集》二），「尤重餘姚，具三不朽（王陽明、黃宗羲、朱舜水）」<sup>1</sup>。由此可窺知中村敬字重視漢學教育與經世思想結合的一面。他的治學方法以「廣採博綜，不偏不倚」為原則，盡量汲取具有實用性的東西文化精髓並融合於明治社會，這是他為學的基本態度。

中村敬字留學英國之後，其宗教觀也有了極大的轉變，在《請質所聞》中表露出傾心基督教教義的宗教思想，批評昔日德川幕府的禁教作為，闡述西洋諸國的富強根源於基督教之敬愛精神，強調基督教是帶動歐洲文明發展之主要因素。文中頻頻述說日本欲躋身近代國家之列，有必要認同基督教精神，接受基督教之存在。例如他的「敬天愛人說」（上、下篇）嘗試將基督教的「神」，依儒教的「天」來作綜合的詮釋，上篇以儒教的傳統為基礎，論述「敬天」與「愛人」思想，下篇則結合「敬天」與「愛人」成為其主張的思想之一。

中村敬字自1870年留英返國後，陸續翻譯了英國勵志作家斯邁爾斯（Smiles Samuel，1812-1904）的《自助論》為《西國立志編》（全十一冊，1871）<sup>2</sup>、哲學·經濟學家密爾（John Stuart Mill，1806-1873）的《自由之理》（全五卷六冊，1872）、《共和政治》（全三冊，1873）、《西國童子鑑》（全三冊二卷，1873）、《西洋品行論》（全十二冊，1878-1880）等名著，藉以倡導重視修為、提昇品格、建立志趣理想，鼓吹自由民權信念，進而推動近代化的思想改革熱潮。《西國立志編》與福澤諭吉（1835-1901）之《西洋事情》、內田正雄（1838-1876）之《輿地誌略》被列為「明治三書」，同為明治初期啟蒙西洋文明之暢銷書，影響日本極深，成為當時日本自由民權之核心思想，間接促使日本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也受到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他藉由西書日譯之管道，將先進的西學知識與制度注入日本社會，發揮文明開化之功。

本文擬探討中村敬字（以下稱敬字）擔任昌平坂學問所、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及留學歐洲的經驗所孕育的文明論、進化史觀、自由論、政體論等啟蒙思想的特徵，通過他透譯西書與貫通東西

1) 中村敬字著，柳澤信大筆《自敘千字文》（東京：中村一吉，1887年）頁2a。

2) 原名《自助論》*Self Help*，1859年。內容敘述數百名西洋古今人物之立志傳記及個人主義道德說，打破階級制度，倡導有能力、肯努力者皆有出世機會，激勵並影響了許多日本年輕人之思想走向。《西國立志編》日譯本成為日本近代化之精神支柱，許多小學將它列為教科書，作為啟發學生修身之用。明治時期之總發行量超過一百萬冊。

文化的實踐過程，考察其論述漢學的實用性與西洋科學的應用性之結合問題，進而闡明他如何透過儒家學說及基督教義，轉換其「自—他」的認識，實踐「用之於人民」新學問的形成。

## 一、中村敬字的人物像

中村敬字為日本德川幕末・明治的啟蒙思想家。出生江戸（今東京）麻布，幼名釧太郎、敬輔，號敬字，諱正直，幼年隨昌平黌教授佐藤一齋（1772-1859）、古賀侗庵（1788-1847）學儒，與桂川甫周（1751-1809）修習蘭學<sup>3</sup>，又與箕作奎吾（?-1871）學英文。敬字資質聰穎而好學不倦，24歲即成為幕府「昌平黌」教授。當時美國東印度艦隊司令培理（Mather C. Perry, 1794-1858）已在1853、54年二度叩關日本，德川幕府被迫卸除「鎖國」最後一道防線，隨著門戶的開放，日本社會面臨排山倒海而來的衝擊。1866（慶應2）年，幕府從朝臣子弟中招募年輕學子，通過「開成所」<sup>4</sup>的考試後，甄選出十四名優秀人材前往歐洲留學，敬字以幕府「赴英國留學生取締役（監督）」的身分同行，時年35歲。1868（明治元）年因德川幕府瓦解而歸國，成為「靜岡學問所」<sup>5</sup>的教授，此時他提出〈敬天愛人說〉的理念，相關內容後文敘述。翌年他在靜岡北郊大岩村創辦私塾同人社，有「江戸川聖人」之稱。斯邁爾斯的《自助論》曾是英國最暢銷書籍，經敬字逐譯成《西國立志編》後，於明治社會引起廣大迴響，這本“SelfHelp”的翻譯書，不僅是舊佐幕派的子弟，同時也受到維新日本各階層的歡迎，成為明治時代最受歡迎的暢銷書，它象徵島國的新時代精神，振興了日本國民的志氣。至二十世紀初期此書喚起中國知識分子的重視。亡命日本的梁啟超於橫濱創刊發行之《清議報》中，即讚譽曰：

其（按：《西國立志編》）振起國民之志氣，使日本青年人人有自立自重之志氣，功不在吉田（按：松陰）、西鄉（按：隆盛）下矣。今將其原序錄出，雖嘗鼎一臠，猶足令讀者起舞矣<sup>6</sup>。

可以窺知敬字的譯書《西國立志編》之內涵影響當時日本年輕知識分子最深者，即是喚起「自立自重」的思想。自立是指能夠自助，不用倚賴他人的意思。自助的精神是喚起一般人才智的根源。依照敬字的說法，自助者的人數越多，國家更能充滿生機，國民精神會更強盛。日本被迫「開國」

3) 中村敬字與《和蘭字彙》的作者桂川甫周學習蘭學。詳見石井研堂《中村正直傳：自助的人物典型》，（東京：成功雜誌社，1907年），頁28-31。

4) 「開成所」由江戸幕府創立，原為教授荷、英、法、德、俄各國洋學知識之學校，1863年改稱「洋書調所」，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後改稱「開成學校」，1869年改稱「大學南校」，1871年改稱「南校」，1877年之後成為東京大學的一部分。

5) 原為德川藩的學校，又稱靜岡學校，是當時代表日本政府之最高學府。

6) 《清議報》第28號，1899年9月，收入新民社輯《清議報全編》（全二十六卷，臺北：文海出版社，1986年）卷6，第二集乙名家著述「飲冰室自由書」第三，頁21。

之後，面對列強的壓境，如何使國家生存、發展是最大的課題，而德川幕末士農工商的階級制度開始崩壞，日本人正在為個體究竟人如何生存感到憂慮。此時，「自助精神」的推動與普及，顯得格外重要。

1872年，敬宇出仕大藏省，翌年受洗為基督徒，曾與福澤諭吉等人共同創立「明六社」、發行《明六雜誌》，致力於日本明治初期的女子教育和盲啞教育的紮根工作，多所貢獻。1881年，敬宇獲聘為東京大學教授，其門下生市村瓊太郎、瀧川龜太郎、西村天囚、島田鈞一、林泰輔、井上哲次郎都在明治期的日本學術界各占一席之地。1888年，敬宇獲頒文學博士學位，1900年轉任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並受託為〈教育敕語〉寫草案，卻由於保留基督徒的「天」觀來進行闡釋，被元田永孚等主事者認為不夠尊重天皇的至高地位，雖經歷將近十次的修改，仍不獲採用<sup>7)</sup>。身為傑出漢學家，又具留歐背景的敬宇，在「鎖國」、「攘夷」、「開國」複雜的國家體質轉換過程中，其儒學觀、宗教觀及對西洋學問汲取與運用，有過人之處，他以「患難見真材」的知識人本分，帶領日本走向文明開化的道路。敬宇啟蒙思想的形成，大致可分成下列四個時期。第一，儒學教育與留英時期；第二，靜岡學問所時期；第三，啟蒙活動時期；第四，「教育勅語」草擬時期。以下就敬宇的儒學觀、宗教觀及其西洋學問探索，分別敘述。

## 二、中村敬宇的儒學觀

### (一) 〈漢學不可廢論〉

敬宇自幼即接受漢學教育，其儒學思想影響之後的思想發展，左右著畢生的思想和作為。1887（明治20）年5月8日，敬宇以〈漢學不可廢論〉為題發表演說，其中提示他對儒教、宗教問題的諸多看法，內容如下：

隨學術日益進步，教法之真理亦日益得證。視耶穌教為奇怪之說，謂源自猶太未開化之國。則今拓展於文明諸邦之電信鐵道蔓延的時代為何？曰其大要有二。一者，因上帝即真神、即造物主、即真君、即真元、即支那所謂以天為其教之根本。一者，因其救靈之說深適人好生惡死之情<sup>8)</sup>。

在宣導漢學不可廢之餘，敬宇不忘強調宗教的重要性與貢獻，並駁斥相關無稽之談。他自始至終未曾反對基督教，對弘揚儒學亦不遺餘力。主張無論基督教義或儒家學說都必須透過實踐，進而普及於社會，用之於人民。我們可以發現他論述後世漢學者的流弊，主張儒家古典文獻的價值，

7) 陳瑋芬〈井上哲次郎的《敕語衍義》—關於「忠孝」的義理新詮—〉，《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1996年），頁201-208。

8) 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東京：松井忠兵衛，1888年），頁108。

認為維新以後的漢學教育是衰退的，因此，提出〈漢學不可廢論〉<sup>9)</sup>，批評當時的漢學者缺乏高瞻遠矚的見識，嘆曰：

吾邦漢學者，多不研究堯舜禹湯之經濟、文武周公之薪傳。不知天道之欽崇，格致之學名存實亡。所謂經學家，大抵止於文字章句之論，不過如玩古董古物。所謂詩文家，大率流於浮華，實際疏闊。此二教者，如何與聖賢大學之道相關乎？況不曉日進之理，所以有甚者，當洋學佔上風之際，聽聞忠孝仁義名目外，自主自由、權利義務、君民同治、共和政治等稱呼，即驚之為邪教。視開明諸國為夷狄，如懷井蛙之見。漢學日益卑於世，豈非自取乎？

顯然，敬字要普及的漢學教育是追求聖賢大學之道，非止於文字章句之論或流於浮華之學，是要與西洋的自主、自由、權利、義務等新學問結合的核心價值。敬字認為儒者的責任並不只是談論孔子、孟子的學說，閱讀中國古典書籍而已。雖然身為德川幕臣，但在面對近代化的新時代，除了思考自身及國家如何生存外，曾經從王陽明的學說中，體會到立志精神的重要性，同時從西洋的新學問中，悟出實學實用的道理。在靜岡學問所，敬字除了漢學，同時也教授洋學，無論學生身份貴賤，立志學習者一律傳授知識。主要希望日本年輕人能夠在新時代中運用新知，助長日本的文明開化之路。因此，白天與年輕人一同閱讀漢籍，晚上則研讀英文書汲取西洋的學問知識。

敬字提及，孔子將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就如尼采 (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 將人分為像君主的人和像畜生的人，二者的思惟都是一種徹底的精英主義。此外，獨裁主義者讓無知的大眾相信「君主」，依賴「君主」，此與西方的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大相逕庭。敬字的想法是「政府必須讓人民依賴，但不可依賴人民」，這種主張是強調民主、民本思想的重要基礎。

## (二) 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行不悖

1881 (明治14) 年，敬字標註訓點之《天道溯原》在日本刊行，希望普及儒教道德與基督教信仰並行不悖關係之瞭解，對明治中期的宗教界影響深刻<sup>10)</sup>。除了西書逐譯、漢籍標註訓點之貢獻外，敬字對於推廣漢學教育盡心盡力。1872年曾於大藏省翻譯局工作，1873年開設私塾同人社，1875年創立訓官啞院，1881年任東京大學教授，1890年，任東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 (御茶水女子大學前身) 校長，對女子教育、幼兒教育、視力聽力障礙者教育奉獻良多。1879年，敬字於東京創設「同人社女學校」，主要的教育宗旨即在強調宗教自由、漢學教養與西學吸收同等重要，因此在漢學課表中編入「輪講」、「講義」(經史類、文章類、作文)、「素讀」(以經書內容為主，反覆

9) 同上注，頁119-120。

10) 中村正直曾於明治11年 (1878)，擔任原胤昭編《新約聖書》(和漢對譯) 之訓點工作。

誦讀，直到熟記<sup>11)</sup>。敬宇呼籲不可忽視漢學教育，這種想法與其他西學急進派思想家相較，算是落伍保守。

### (三)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乙部」

明治初期，日本的漢學教育已擋不住朝野吸收西洋文明的熱潮。1883（明治16）年4月16日，敬宇於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乙部」開學典禮發表演說時，感嘆道：

當此時棄漢學如土苴。或有漢學者鬱憤不堪，不平之餘，入海致死。……假以吾譯《西國立志編》十部交換《佩文韻府》之古渡最上之本，書肆欣然而有喜色。至佛書則更甚<sup>12)</sup>。

並指出當今朝野卓然顯眾、有用之人多有深厚的漢學根基，對眼前學子寄予高度期許，曰：

觀夫方今以洋學稱名家者，無非元來有漢學質地而活用洋學者。無漢學之素者，或七、八年、或十餘年留學西洋歸國後，雖嶄然露其頭角，其乏運用之力，殊至於翻譯而決不能下手。然則今日在朝野間，推卓然顯眾有用之人物，亦可斷言無非漢學者也。唯以漢學為裏、洋學為表而已。……夫如此時，漢學書生何負明治之維新，非獨不負明治之維新，欲云於明治維新有勳勞，其豈可得哉<sup>13)</sup>。

「古典講習科乙部」為東京大學文學部附設單位，靠政府特別預算營運，有別於專授「國學（日本學）」之「古典講習科甲部」，以講授漢學為主，是專為培育漢學人才而特別增設的科系<sup>14)</sup>。敬宇感於漢學教育日益式微，呼籲年輕學子把握得來不易之學習機會，努力成為對明治維新有勳勞之鴻儒碩匠<sup>15)</sup>。

敬宇重視漢學教育，但在其〈論經學〉一文中，明白批評漢學、宋學各以經為羽翼而標榜學派<sup>16)</sup>；在〈論學弊疏〉中，指摘時下學者空談心性、流於虛學、不重實際，曰：

士務虛文，而疎實用，其能通當世之務者，百不一二有焉。……今之所謂學者，徒疲思慮精於文字章句之末節，而不復顧其實用如何？高談性命，肆說仁義，細析毫芒，而至於錢穀財賦之事，茫然罔曉也。曰：「彼非吾事也，亦不恥其不知。」故今之所謂學者，不惟其行惟其書，不惟其事惟其理<sup>17)</sup>。

11) 《中村敬宇》，頁164。

12) 中村正直〈古典講習乙部開業演說〉，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頁43。

13) 中村正直〈古典講習乙部開業演說〉，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頁45-46。

14) 東京大學「古典講習科乙部」於明治18年（1885）福澤諭吉喊出「脫亞入歐」口號之際，即停止招生，1887年縮短修業年限為三年，1888年廢科。總共只送出兩屆四十四名畢業生。

15) 中村正直〈古典講習乙部開業演說〉，中村正直述、木平讓編《敬宇中村先生演說集》，頁50。

16) 中村正直〈論經學〉，《敬宇文集》，卷2，頁11a。

17) 中村正直〈論學弊疏〉，《敬宇文集》，卷1，頁1b-2a。

認為如何找回漢學的實用性以與西洋科學的應用性結合，是一項具迫切性的課題。

「敬宇為人，純白簡易，立身有本末，無隨俗俛仰之態。壯歲走歐羅巴，改求當世之所謂洋學，盡得其術以歸，能識其文字，又能用漢音，讀中國之書。然敬宇意恒在通東西之故而劑其平，不泥古，不薄今，舍己短，取人長，深合漢儒實事求是之旨，豈非君子之用心而能若是乎。」<sup>18)</sup> 這篇文章擷取自1889年中國第二任駐日公使黎庶昌（1837-1898）為摯友遺世的《敬宇詩集》撰寫的序文，簡明扼要而貼切地描述了敬宇其人其事。文中對於他擅長的古詩文創作，亦有具體而微的評述，曰：

敬宇生平著述甚富，其古文尤自成家，波瀾態度，不滯不溢。余嘗為藏名山文序，粗發其凡，詩特餘力所及耳。而其意趣頗與白、陸為近，余尤喜其中多諷諫之詞，若仿《白氏文集》體例，以諷諭閒適感傷等<sup>19)</sup>。

又，張文成作〈中村正直先生詩跋〉，描述其詩「非風騷，非漢魏，闢古人之蹊徑，成一家之至言，具有真意，不失正軌」<sup>20)</sup>。

1897年（明治30）訪問日本的晚清口岸知識人王韜（1828-1897）曾經為敬宇寫了一首詩，詩曰：「修文館裏曾相見，知是騷壇擅盛名，自愧東遊真草草，未攜行卷謁先生。」詩中表露訪日期間未能把握機會，與「至君獨以儒學顯，文章儻稱一時」<sup>21)</sup>的敬宇縱論經史百家說之遺憾。

事實上，敬宇除了具有儒學及「西書和譯」的專業素養之外，也傾心於明治初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化改革。例如，他翻譯《自由之理》，成為當時日本自由民權的核心思想，間接促使日本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當時自由黨領袖河野廣中（1849-1923）<sup>22)</sup>於1873年閱讀《自由之理》後，即興起革命意念，說道：

迄今受漢學、國學陶養，動輒倡揚攘夷之歷來思想，於一夕間興起大革命，得知人之自由、人之權利應當尊重，又自覺施行政治必須奠基於廣大民意，深切銘感在心，於胸中深刻勾畫自由民權之信條，實為余之生涯開啓至重至大之轉機<sup>23)</sup>。

此外，與敬宇同時代之自由民權運動理論的指導者植木枝盛（1857-1892），其主張之自由論點亦

18) 黎庶昌〈敬宇詩集序〉，《敬宇詩集》，卷1，頁1a。

19) 黎庶昌〈敬宇詩集序〉，《敬宇詩集》，卷1，頁1b。

20) 張文成〈中村正直先生詩跋〉，《敬宇詩集》，卷4，頁61b。

21) 王韜《扶桑遊記 中》，頁3b。

22) 河野廣中，明治初期政治家，出身福島縣三春。為東北自由民權派之核心人物，1882年因鼓吹自由民權運動，引發「福島事件」被捕入獄。後歷任日本眾議院議長、農商務大臣，晚年致力於日本的普選運動。

23) 下出隼吉〈自由之理解題〉，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全集》（東京：日本評論社，1967年），卷2，頁2。原為日文，譯文責在筆者。

受到密爾《自由之理》的影響<sup>24)</sup>。

1873年（明治6）7月，留美歸國的森有禮（1847-1889）<sup>25)</sup>號召西村茂樹（1828-1902）、西周（1829-1897）、津田真道（1829-1903）、加藤弘之（1836-1916）等人，成立日本最早的近代文明啟蒙學術團體「明六社」<sup>26)</sup>，敬宇亦在成員之列，當時他們介紹歐美天賦人權、功利主義等思想，是日本後自由民權運動、大正民主主義（Democracy），乃至憲法產生的原動力。日本的自由民權運動起於《明六雜誌》刊行之1874年，主要訴求是成立國會、制定憲法、減輕地租、確立地方自治以及廢除不平等條約。

#### （四）《明六雜誌》的中的敬宇思想

敬宇曾於《明六雜誌》中，發表〈西學一斑 一～七〉、〈人民の氣質を改造する説〉、〈善良なる母を作る説〉、〈支那不可侮論〉、〈賞罰毀譽論〉等論稿<sup>27)</sup>，強調日本欲達到近代化目標，首重精神改造，若人民氣質未能提升、品行不求良善，則政體之改造亦無法成功。1876年與大槻愛古（1801-1878）<sup>28)</sup>共編之《愛敬餘唱》漢詩集中，收錄了中村正直的〈愛敬歌〉，其部分內容如下：

嗟々今世人，子弟缺溫情，夫妻相反目，朋友互詬病。至邦國交際，崑以兵力競，妖氣滿神州，何時得洗淨<sup>29)</sup>。

敬宇憂慮民心未能淨化，過度追求富國強兵引發社會亂象，批評好戰分子攻打臺灣、覬覦朝鮮、併吞琉球，表達對主戰者之不滿。此外，敬宇於《礫川集》之〈書感〉一文中，更明白表達其反

24) 宮城公子指出植木枝盛的自由論主張是以明六社之「人生三寶說」為基礎，再從翻譯書中獲得密爾、史賓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等人的英國功利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而形成的。詳請參閱宮城公子〈日本の近代化と儒教的主体〉，《日本史研究》第295號（東京：日本史研究會，1987年）。宮城之論文已由許婷婷譯成中文出版，收入張寶三、徐興慶編《德川時代日本儒學史論集》（台北：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04年），頁243-277。

25) 森有禮為薩摩藩（今鹿兒島）藩士，德川幕末曾赴歐美留學。回國後成立「明六社」為國家建言，導入新政。擔任文部大臣期間公佈學校令，奠定日本教育制度之基礎。森有禮是歐化主義者，於日本帝國憲法頒佈當天，遭日本國粹主義者暗殺。

26) 「明六社」因成立於明治六年（1873）而得名，是明治新政府成立後，文人雅士結社之濫觴，由森有禮發起，草創成員另有福澤諭吉、杉亨二、箕作秋坪、箕作麟祥等，其後田中不二麿、大槻文彥、津田仙、辻新次、九鬼隆一、畠山義成等人陸續加入，可謂集當代啟蒙思想家於一堂。所發行之《明六雜誌》壽命很短（自1874年3月至1875年11月），但是刊載內容涵蓋對明治社會百般現象的評述、時事評論與急進主義新思想之介紹。

27) 高橋昌郎《中村敬宇》（東京：吉川弘文館，1988年），頁146-147。

28) 大槻愛古，又名磐溪，蘭學家大槻玄澤之子。因接受成為漢學家的刻意栽培，以利於協助父親與蘭學同好將荷蘭文翻譯成當時的學術語言漢文體，而進入昌平黌學。

29) 中村正直〈愛敬歌〉，大槻愛古編、中村正直校《愛敬餘唱》（東京：珊瑚閣，1876年，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藏版），頁20b。



對「征韓論」的感想，曰：

何物唱征韓，非愚則狂耳。我欲曉其人使自知其否。敵小不可侮，古人謀猶是。勿利鄰國難，其言亦可採……古今尚德者，國運可隆起，尚力而好戰，亡滅立至矣<sup>30)</sup>。

敬宇批評明治政府覬覦朝鮮、併吞琉球的不當行為，從「崇尚道德足以興國，以力迫人，亡滅立至」的角度予以建言之外，也可以窺知他將傳統學問的道德論用於文明開化之上的原因。敬宇對明治初期的日本社會面臨西方勢力東漸，負有諸多的使命感，使得他不僅致力於日本漢學的普及運用並落實傳統學問、學理的實踐，更關懷西方學問、文明思潮的引進，常撰文批評時政，呼籲日本兼顧傳統與近現代，迎頭趕上歐美。敬宇具有歐洲留學經驗，關注西歐政治、法制及宗教問題，回國後藉由西書日譯之管道，將先進的西學知識與制度注入日本社會，提供了一種目的論式的圖像，這個圖像不但沒有去傳統學問的缺點，反而融合了西方文明的長處，發揮文明開化之功。可惜明治政府不理會敬宇對改善內政、淨化人心之訴求，更忽視其主張安內先於攘外之遠見，而一味朝發展軍國主義之歧途前進。

近代日本浪漫主義 (Romanticism) 先驅、文藝評論家北村透谷 (1868-1894)，稱讚敬宇為明治初期「內部的改革家」，以突顯其與另一位「外部的改革家」福澤諭吉在明治日本思想界同樣佔有一席之地。北村對敬宇之評語如下：

敬宇先生非改革家，乃適用家。靜和保守，卻致力泰西文物之注入。狹義而言，彼調和東西文明，救儒教、道教於其末路，亦同時促使泰西化育得以適用。彼以其儒教的支那思想，崇敬斯邁爾斯之「自助論」。有正直抉擇、無熱心事業，有溫和崇敬、無執著崇拜。彼有此適用、此抉擇、此崇敬，故免於淪為明治革命迷兒。挺立於多數主張漢學思想之學者中，能馴致革命氣運，為明治思想建設立大功，實因擁有斯等特性使然。就改革家層面，不遑多論敬宇先生並非偉大人物。然而於保守派中，敬宇先生至少是思想界之一介偉人。新舊世界於彼之中，得以保有罕見之調和。福澤翁與敬宇先生實為新舊二大潮流中最易辨識之指標<sup>31)</sup>。

透過北村透谷敏銳的觀察力，洞悉敬宇於明治初期思想界發揮了其應有之影響力。上述評語可約略窺知敬宇認為日本不應全盤西化，主張重視漢學教育與東西文明之調和。憂心長年深植日本社會之儒教思想及漢學教育式微，因此翻譯密爾自由思想之評述或贊文中，刻意大量使用漢語表現之詞句，並積極闡揚孔子學說。

30) 中村正直〈書感〉，《敬宇詩集》卷3，頁48a。

31) 北村透谷〈變遷の時代：明治文学管見の三〉，星野慎之輔等編《透谷全集》（東京：博文館，1902年），頁145-146。原為日文，譯文責在筆者。

### 三、中村敬字的宗教觀

以下針對敬字的宗教信仰過程，對敬字的宗教思想作進一步的理解。就信仰而言，敬字少年時期曾經抄寫《法華經》，母親過世時以《法華經》助念，也曾經參詣淺草觀音，留英歸國後改信基督教，晚年參拜過伊勢神宮，並自學梵文，投身於《法華經》的研究<sup>32)</sup>。換言之，敬字一生的信仰對佛教、基督教、神道都有涉獵。

敬字主張的「敬天愛人說」是他終生提倡的宗教哲學思想，從晚清美國渡華的傳教士丁韞良(William A. P. Martin, 1872-1916)的漢語基督教作品《天道溯原》中，獲得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所提倡的儒教與基督教的折衷說—原始儒教的「上帝」、「天」與天主教的「天主」同義之概念，而主張自己也可身兼儒者與基督教徒，兩者之間並無矛盾。敬字也受到上海地區最早的天主教基督徒徐光啟(1562-1633)的「事天愛人說」的影響，而延伸出「敬天愛人說」的思想主張。敬字曾經撰寫〈擬泰西人上書〉，向皇室及明治政府高層傳播教法(religion, 當時日本尚未確立「宗教」的譯語)，其內容如下：

陛下其亦知西國之所以富強乎。夫富強之原由于國多仁人勇士，仁人勇士之所以多出者，莫非由教法之信心、望心、愛心者。西國以教法為精神，以此為治化之源。匪獨此也，至于妙絕之技藝、精巧之器械，有創造者，有修改者。其勤勉忍耐之大勢力，莫一不根于教法之信、望、愛三德者。蓋今日西國之景象者，不過教法之華葉外茂者，而教法者實為西國之本根內托者。<sup>33)</sup>

敬字大膽的建言提及：「善樹結善果，惡樹結惡果。今日之開化日新者，果也。教法者，樹也。陛下若以西國之果為善耶，則請無疑于其樹之善也」。<sup>34)</sup> 敬字的〈擬泰西人上書〉的內容曾遭致社會反感，但他自始至終並未捨棄儒教。在《加藤翁年譜序》中提出了如下的說明：

余嘗作〈擬泰西人上書〉文，世之儒者或以余為助異端者，嘩而攻之。然其實敬仰孔子始終不變，且深願孔子之道行於上等社會，為治平大本也。<sup>35)</sup>

敬字相信利瑪竇《天主實義》中提到的「天主亦即儒書所稱之上帝」，以此概念來理解基督教。敬字為了補述「敬天愛人說」，撰寫〈請質所聞〉，提出「曰天，曰上帝，曰神（謂真一之神，不可

32) 高橋昌郎《中村敬字》(東京：吉川弘文館，1966年)，頁273，277。關於中村敬字宗教觀內容和轉換歷程，請參閱荻原隆《中村敬字研究》(東京：早稻田大學出版部，1990年，頁213-239)。

33) 〈擬泰西人上書〉，《敬字文集》卷1，頁7a。

34) 〈擬泰西人上書〉，《敬字文集》卷1，頁9a。

35) 〈加藤翁年譜序〉，《敬字文集》卷15，頁10a。

與鬼神之神混)，曰造化之主宰，名異而義一。」<sup>36)</sup>，重申對宗教的看法。

#### 四、中村敬宇的西洋學問探索

##### (一) 敬宇的「內在改革論」

明治維新使日本關注的焦點由傳統中國轉向近代西洋，主要是轉向學習西洋文明的模範。敬宇在主張「傳統與近現代融合」的思想形成過程中，有其深厚的漢學基礎，但自英國留學回日本之後，則以引介西方思想為多，一直到翻譯《西國立志篇》之後，整體的「內在改革論」有了轉變。我們發現敬宇在「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中，對西方的工業化帶給人類的進步，表示讚賞。本節將針對敬宇抒發思想的作品內涵，探討其「內在改革論」。敬宇在「西國立志編第二編序」提及：

福哉！今日西國之民也，雖古帝王庸何及乎。昔者方隅自封，智識狹隘，今也四海交通，學問淵博。昔者教化不明，風俗慘刻，今也崇敬神明，志行虔識。昔者君上專權，民如奴隸，今也人得自主，共謀公益。昔者教法有禁，強迫人心，今也任民自擇，王者不問。

可以看出，敬宇是以過去與現在的強烈對比，隱喻日本維新前與後的轉向，內在的改革已大有不同。<sup>37)</sup>

晚清駐日本參贊黃遵憲（1848-1905）在《日本雜事詩》的序文中，曾經回憶與當時仰慕中華文化的守舊派學者交流的往事，提及：「我交際的日本人以舊學者居多，這些人對明治的新時代，多所諷刺與批評，且不斷的讚嘆」，並說，當初自己也與這些守舊派學者有相同的想法。相對於此，敬宇對於西洋的新學問卻有不同且開明的看法，明確主張明治日本未來發展的目標在工業化的提升，在《自由之理》中更主張政府的權限應加以限制，而人民的市民、社會之自由應受到保障。這種強調自由的內在改革之想法不僅影響明治社會，多少也影響到其他東亞的周邊國家。換言之，敬宇將斯邁爾斯對工業文明的禮讚、人民自由的保障，透過漢文的翻譯將其內在改革的精神傳播到東亞漢字圈國家，可以媲美斯邁爾斯的自助理念透過義大利小說家 Edmondo De Amicis（1846-1908）兒童文學的古典作品《Cuore，心·愛的教育》傳播到義大利之例，有異曲同工之妙<sup>38)</sup>。

36) 野村純代〈中村正直「請質所聞」訳注稿 一〉，《東洋大学大学院紀要》45（東京：東洋大學，2008年），頁246。

37) 中村正直《敬宇文集》，卷5，頁7a。

38) 平川祐弘〈中村の漢文著作の啓蒙的意義〉，收入《天ハ自ラ助クルモノヲ助ク》（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8-279。

## (二) 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的折衷思想

敬宇在〈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中，不斷強調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在「由于人民篤信天道，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權，由于政寬法公。拿破崙論戰，曰：德行之力，十倍于身體之力。斯邁爾斯曰：國之強弱，關於人民之品行。又曰：真實良善，為品行之本。蓋國人眾相合之稱，故人人品性正則風俗美，風俗美則一國協和，合成一體，強何足言。若國人品行未正、風俗未美，而徒汲汲乎兵事之是講，其不陷而為好鬪嗜殺之俗者幾希？尚何治安之可望哉！且由天理而論，則欲強之一念，大悖於正矣。何者，強者對弱之稱也，天生斯民，欲人人同受安樂、同修道德、同崇知識、同勉藝業，豈欲此強而彼弱、此優而彼劣哉。故地球萬國當以學問文藝相交，利用厚生之道，互相資益，彼此安康，共受福祉。如此，則何有乎較強弱、競優劣哉」。<sup>39)</sup> 顯見敬宇為一非戰論者，反對日本併吞琉球，實源於其堅實的道德理論基礎，有跡可循。同時其一系列言論中可以窺得具有「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的折衷思想主張，這些思想主張對於一面倒向全盤西化的明治社會風潮，具有踩煞車的作用。

康有為在《日本書目志》(1897) 序中，曾經述及敬宇的《西國立志篇》，曰：「太西之所以強，並不在軍兵砲械，而在其士人學習新法之書」，這是敬宇的思想影響中國知識份子的一個例子，康有為在戊戌變法運動的過程中，不斷強調「新法之書」的重要性，或許是受到《西國立志篇》內涵的影響。

1898年(明治31)，百日維新失敗，繼康有為之後亡命日本的梁啟超，經由黃遵憲介紹敬宇其人其事，閱讀過敬宇翻譯的《自由之理》，讚譽「日本中村正直是維新的大儒」，更讚賞敬宇在翻譯《西國立志篇》等作品，帶給東亞世界吸收「自由」知識的貢獻。梁啟超在1990年給康有為的信中，也述及中國必須樹立自由精神，除去奴隸根性的重要性，顯然是受到敬宇內在改革思想的影響。

## 結語

敬宇在德川幕末成為「昌平黌」的儒臣，是當時學問世界最具權威的知識人之一，同時也是贊同西洋文明的洋學者。特別是，敬宇透過譯注典籍以介紹英美的各種啟蒙思想——自由論、政體論、進化史觀、文明論，傳達了西洋人自立自主的志向，提示西洋文明的偉大在於人民發揮了勤勉努力、力爭上游的態度。更強調「敬天愛人」，關注從東亞世界的聖賢學問到西洋文明新學問的轉換，為普及其經世濟民理念而發聲<sup>40)</sup>。敬宇翻譯的《西國立志編》成為明治初期日本最大的國

39) 中村正直〈西國立志編第一編序〉，《敬宇文集》卷5，頁6。

40) 有關中村正直的「敬天愛人」思想，請參閱藤原暹、平野尚也〈中村敬宇における「敬天愛人」の思想〉，Artes Liberales No58，(盛岡：岩手大學，1996年6月)，頁13-24。

民啟蒙書，不但在日本近代工業社會的建設過程中發揮了國民教科書的功能，在日本文化發展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明治中期的小說家幸田露伴（1867-1947），在《明治初期文學界》（1933）中稱讚敬宇對明治日本的文明開化、對當時代年輕人的感化，超越了福澤諭吉的貢獻。當然，日譯版《西國立志編》發揮的功能，有別於斯邁爾斯的自助論“Self Help”在英國文化史上的貢獻，這是兩國國情不同所致，無庸置疑斯邁爾斯的思想影響了英國，更影響了日本，而其間文化傳播的功勞者即是中村敬宇。

敬宇對日本文明開化的關懷，立基於其深厚的儒學素養，從致力漢學教育，到對吸收西洋文明的倡導，與明治日本的傳統維護及新學問形成密不可分。敬宇心目中的漢學價值觀，可從以下他在1875（明治8）年擔任首任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致詞內容得到答案。敬宇引用《禮記·大學》中的「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作為教育宗旨，將儒家思想尊崇的信條，以自我完善為基礎，通過治理家庭，女子教育可發揮「達則兼濟天下」之效果，對國家發展作出貢獻。敬宇將其理念延伸至女子教育與傳統儒教的結合。同時，敬宇亦強調東西文化融合的文明史觀，也必須與女子教育結合。致詞說到：

邦國（日本）文明與善的政治有關，而善的政治與善的家法有關。欲推動善的家法，必須端正婦人的心志，增長其知識，進而使其有良善的操行。吾國不乏古今善行的婦人，但從邦國整體觀之，教養婦人的方法卻甚欠缺，今日因文明日趨進化，才創立東京女子師範學校。（中略）冀望在本校學習者畢業之後能輔佐丈夫，培育善良的人民，促使吾國成為具有福祉安寧之邦<sup>41</sup>。（原日文，筆者譯）

敬宇對當時日本女子高等教育的理念，無疑是一種新概念的傳播，可窺知敬宇將儒教文化融合在日本社會的創新作為。如上所述，敬宇對於東、西文化的內涵提出精闢的分析，再貫徹其融合、創新的實學實用理念於明治社會，此為本文探討敬宇思想內涵的主要原因。

---

41) 此文為中村敬宇擔任首任東京女子師範學校校長的致詞稿。引自平川祐弘〈中村の漢文著作の啓蒙的意義〉，收入《天ハ自ラ助ケルモノヲ助ケ》（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75。

